



## 明嘉靖朝祭器定制再變議

■ 陳玉秀

明洪武時期（1368-1398 在位）制定祭祀天地日月四方用碗、盤、尊等日用瓷器；後代的明嘉靖皇帝（1522-1566 在位）更進一步明定以青、黃、紅、白四種單色釉瓷來區別四方祭器的顏色。<sup>1</sup> 庫房整理瓷器的過程中，也發現嘉靖時期單色釉器皿，有一部分貼金彩，更多是陰刻龍紋，它們在禮制儀式上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又，為何選用這四種顏色來祭祀？諸多問題形成這篇文章的觀察重點。

## 祭器花樣

明代祭器樣式與色彩的明文訂定，開國君主洪武及明晚期嘉靖兩位皇帝是主要的關鍵人物。洪武二年（1369）定「祭器皆用瓷」，<sup>2</sup>最晚在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祭孔大典時祭器型制已是「籩、豆、簠、簋俱用瓷楛；酒尊三，用瓷尊」、「爵六，用瓷爵；銅一，用瓷碗」。<sup>3</sup>亦即這時已採用碗、尊、楛（盤）（圖1、2）等日用瓷器造型，取代古銅器的籩、豆、簠、簋等類似入清之後瓷仿銅禮器（圖3、4）的器型。

明世宗嘉靖（圖5），後世稱之為「制禮作

樂自任」的皇帝，因其在位期間，甘冒違逆祖制之名，對「宗廟禮」、「郊祀禮」、「孔子禮」三方面大規模的改革。<sup>4</sup>在國家祭祀上，他除遵循洪武祭器以碗盤尊的型制，並於嘉靖九年頒「定四郊、各陵瓷器。圓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sup>5</sup>的制度，亦即青、黃、紅、白單色釉瓷器成為晚明祭祀天地日月四方的祭器制度。四郊祭器的陳列概況也出現在明萬曆十五年（1587）刊行的《大明會典》。辨識祭天圓丘陳設圖（圖6），據圖上的文字記錄，「籩、豆、簠、簋」改用圈足盤；「登」則用



圖1 明 嘉靖 黃釉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明 嘉靖 甜白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乾隆 白瓷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乾隆 白瓷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 世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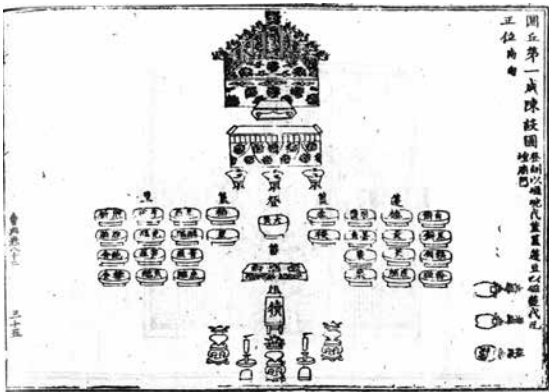


圖6 明 祭天圓丘陳設圖 取自(明)李東陽,《大明會典》,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卷82,頁1298-1。



圖7 明 16世紀 祭藍描金雙耳犧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弘治的御窯瓷器·上》,北京:故宮出版社,2017,頁196,圖81。



圖8 明 16世紀 黃釉描金犧耳著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弘治的御窯瓷器·上》,頁204,圖85。

大碗;「犧尊」、「著尊」、「太尊」代以蓋罐,犧尊器身用金彩繪牛隻(圖7);著尊(圖8)的兩側則設獸首耳;太尊(圖9)簡潔。

學界對於這兩段歷史事件多有討論,內容

主要追溯明嘉靖時期的犧尊(見圖7)、山巖(圖10)等,在器身利用金彩畫牛及山嶽等形象設計概念的源起。其中宋代禮書《三禮圖》及明嘉靖時期刊行的《大明集禮》都是重



圖9 明 16世紀 黃釉描金太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弘治的御窯瓷器·上》，頁224，圖92。



圖10 明 藍釉描金山壘 私人藏 取自Louis, Francois. *Design by the Book-Chinese Ritual Objects and the Sanli tu*. New York: Bard Graduate Center, 2017, 115-118.

要依據。施靜菲認為，明代祭器尊、壘乃取樣《三禮圖》的紀錄，而嘉靖時期色彩的定制才為明代祭器創立了一套新氣象。<sup>6</sup>高憲平則認為嘉靖時期的禮器樣本是依據洪武時期編修的《大明集禮》樣式而來，此書於明洪武時期成書，嘉靖九年（1530）六月重新編修出版。《嘉靖祀典考》一書則記錄嘉靖皇帝與大學士張璁（1475-1539）修改禮器型制與花樣的過程，其中「犧尊正是畫牛於尊腹，如山壘畫山於壘，金壘刻雲雷之象於雷腹者也」<sup>7</sup>的一段對話，呈現此類祭器改制的「實況」。

又，祭器描金製作，在景德鎮御窯廠也有金箔定量分配給畫工的規定。明嘉靖、萬曆年間王宗沐（1524-1592）與陸萬垓（1533-1599）編修的《江西省大志》（以下簡稱《陶書》）〈貼金實用數〉條有「大罇……青瓷貼金，腰線、口、底用金箔二十張，雙耳、肚貼金牛；著罇……青瓷貼金，腰線、口、底、雙耳、肚貼金牛；山壘……青瓷貼金，腰線、口、底、雙耳、肚貼

金山；犧罇……青瓷貼金，腰線、口、底、雙耳、肚貼金牛」<sup>8</sup>的詳細紀錄。整體上，雙繫罇或稱「尊」，是中國千年來流行不墜的日用器。

其實，祭器用陶瓷罇及碗、盤的現象，最晚在唐武則天（624-705）時代已出現。武后的長子李弘（653-675）葬於恭陵，唐垂拱三年（687）其妃封哀皇后陪祀，陪葬器有陶製低溫鉛釉彩繪三牛三足爐及山水畫陶罇。證明此時已開啓日用器彩繪犀牛、山水代表犧尊與山壘的祭器樣式系統，這應該也對宋代《三禮圖》的繪製起了參考作用。<sup>9</sup>祭器日用化的現象，南宋史料多有跡可尋，例如，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十一日，帝與群臣討論宗廟祭器：「今太廟、景靈宮皆宗廟也，唯太廟用祭器，至景靈宮朝獻則用瓶、盞、盤、盃之屬，皆燕器也」，<sup>10</sup>「燕器」即日用器。學界更進一步考證，認為南宋杭州郊壇下老虎洞官窯出土的套盒、盞托等，應都與禮器有關。<sup>11</sup>入元之後，郊祀器物有「青瓷牲盤」、「毛血盛以豆，或青瓷



圖11 明 16世紀 霽青瓷雙繫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盤」等史料，更顯現瓷盤代替祭器的趨勢化。<sup>12</sup> 據此瞭解，明代祭器日用化的定制，其實是沿襲宋元以來的習慣。只是，祭器的日用化，也為我們判斷祭器與日用器之間帶來困難。洪武四年（1371）孔廟祭器雖然有「簠、簋、櫜稍大」的說法，但也只是暗示尺寸較大的器皿具有祭器的功能。

### 尺寸推測器皿功能

罇的類型，因其特殊的犧牛、山嶽紋飾及獸耳等特色，易於判斷其祭器功能。觀察傳世這類雙繫罇的尺寸，不難發現罇的高度都落在30.0至32.0公分之間，口徑大約在17.0至19.0公分左右。院藏也有青釉雙繫罇（圖11），無論是器型、尺寸或雙耳近乎直立的布局都類似祭器犧罇，只缺花樣，這或能推測是祭器簡易化的現象。<sup>13</sup> 然而，需注意的是，《大明會典》祭天圓丘陳設圖（見圖6）中的罇的造型都帶蓋，



圖12 明 16世紀 霽青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目前已知的傳世祭器罇似乎都缺蓋或無蓋。

尺寸作為判斷是否為祭器的方法，也可以在祭典執行時，盛放犧牲毛血的毛血盤上面觀察到。然而，在估算明代毛血盤尺寸之前，有必要瞭解當時的度量衡及瓷器燒造時的收縮比例，並換算明代尺寸與現代公尺制。明皇室鄭恭王朱厚烷（1518-1591）的嫡長子朱載堉（1536-1611）致力於律學、歷學、計量學等科學研究。根據他在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刊行的《律呂精義》的說法，當時尺規制度涵蓋有營造尺、量地尺及裁衣尺。朱氏並以當時寶鈔為度量尺寸的樣本，訂定一定的尺度。學界也據他的說法檢視傳世寶鈔尺寸，並得出當時一尺約為現今公尺制的34.0公分。<sup>14</sup> 而瓷器因人工拉坯、陰乾、燒造等因素會造成尺寸增損訛替，故無準確的標準，因此度量衡應該是採用會有變化的裁衣尺制度。據現代實驗，製作大型陶缸粗坯到燒造完成的收縮比率約在0.90%至0.86%之間。<sup>15</sup> 據《陶書》記錄，「毛血盤，闊一尺五分」（《陶書》，頁837），即毛血盤的瓷坯口徑約35.7公分，燒成後瓷器口徑落在30.7至32.1公分之間。

院藏一類平底、折沿，口徑31.0公分的明代霽青（圖12）及口徑32.0公分的礬紅描金大

盤（圖 13），推測即屬於祭祀用的「毛血盤」。類似的黃釉金彩大盤（圖 14）六件，口徑約 32.0 公分，原藏紫禁城內的齋宮，此地為國家祭祀前皇帝齋戒的場所，也因此，這六件黃釉盤被推

測是祭祀用的毛血盤。（林弈婷，2019，頁 58-67）再觀察明代毛血盤的尺寸也與清光緒（1875-1908）時期，面闊 31.5 公分的毛血盤（圖 15）相仿。這應該也支持院藏祭青盤與礬紅金彩盤



圖13 明 16世紀 礬紅金彩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明 黃釉金彩大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弘治的御窯瓷器·上》，頁318，圖140。



圖15 清 光緒 毛血盤 北京天壇公園管理中心藏 取自北京市公園管理中心編，《園說：北京古典名園文物珍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頁78，圖42。

是毛血盤的可能性。

除了尊與毛血盤能依據尺寸來推測其祭器性質，祭器的類型還有哪些？據《陶書》在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1529-1559）期間共二十二次的燒造觀察，至少兩次責成御窯廠大量生產祭器。嘉靖二十二年（1543）燒造祭天青釉器皿，「青碗二千、青盤一千、青碟二千、青靶鍾一千、青磁茶鍾二千、青酒盞一萬、祭器毛血盤一十、碟一百四十、大羹碗四、酒鍾六百、和羹碗十、爵二十三，籩、豆、盤八十，大尊六、犧尊六、箸（著）尊二、山壘四，又五罇。」嘉靖三十六年（1557）製作「各樣祭器籩、豆、壘、爵、罇、扁壺、大羹碗六千三百六十。拜磚六副。」（《陶書》，頁877、882）在此，籩、豆等以碗、盤代之的概念出發，整合兩則紀錄，祭器至少涵蓋碗三類、盤四類、碟二類，靶鍾（圖16、17）、茶鍾、酒鍾、酒盞、爵、扁壺及拜磚各一類，並尊五類及壘等至少二十種。

嘉靖時期景德鎮御窯廠也委託民間燒造瓷器，以因應皇室的需求。其中《陶書》也羅列器皿與發放民間燒造時，官方應付金額的紀錄。觀察委外的器皿品項，部分可推測為祭器及日

用桌器，且根據品項名稱能瞭解當時的用途與尺寸。以下折算收縮比率並換算成公制尺，節錄如表一。

據史料觀察，器皿的尺寸有區別功能的傾向。除了上述的太尊、犧尊等，高度大約32.0公分；尚有一批口徑尺寸符合祭器茶鍾（圖18）與酒盞（圖19）的單色釉器。院藏尺寸符合桌器的單色釉器甚多，尤其以膳碗（圖20）的造型優美雅緻。

### 祭器色彩的寓意

明洪武元年至九年（1368-1377）期間，國家擬祭祀天地日月於南京城外四方，當時制訂建壇色彩取《周禮》陰陽五行之色，其各方的色彩運用為「東飾以青、西飾以白、南飾以赤、北飾以黑」。<sup>16</sup>洪武十年之後，改天地合祀，日月從祀，在祭壇未成之前，祭禮於奉先殿舉行。目前，我們對明代早期祭器色彩的運用礙於佐證，尚難釐清。然，根據考古出土，學界推測有以白瓷作為祭器的現象。因白色祭器似乎缺乏「國之重器」的莊重，據此也引發嘉靖朝討論祭器色彩的開端，<sup>17</sup>且最終訂定四方祭器色彩



圖16 明 嘉靖 嬌黃暗龍高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明 嘉靖 霽青釉高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一 明嘉靖委外燒造御窯尺寸（公分）與類別

筆者製表

祭器	大酒罈	拜磚	茶鍾	酒盞
	高一尺五寸	長六尺一寸五分	闊四寸	闊二寸八分
	46.0-43.7	188.2-180.0	12.2-11.7	8.6-8.2

桌器	酒碟	果碟	菜碟
	闊六寸五分	闊六寸	闊五寸
	20.0-19.0	18.4-17.5	15.3-14.6
	渣斗	中樣膳碗	小樣膳碗
	高四寸四分	闊四寸五分	闊四寸
	15.0-12.9	13.8-13.2	12.2-11.7

\* 節錄自（明）王宗沐纂修，陸萬垓增修，《江西省大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頁836-839。



圖18 明 嘉靖 霽青釉撇口茶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明 嘉靖 甜白酒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明 嘉靖 嬌黃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明 嘉靖 霽青袖龍紋大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運用的專一化。

明嘉靖九年頒布「圓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的成命如前引，其中方丘為地壇，位與北方，是祭祀山川、大地的祭

壇。嘉靖皇帝並未承襲洪武時期「北飾以黑」的思維，而將祭地改用黃色。這項改變影響嘉靖之後祭器色彩的運用，直至清代。那麼這四類色彩在陰陽五行中又有哪些寓意？



圖22 明 嘉靖 黃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明 嘉靖 甜白釉雲龍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一、祭天地用青與黃

國家祭祀，<sup>18</sup>祭天用青釉瓷（圖 21），明嘉靖九年定冬至時節祀天，並以五星、二十八宿、風雲雷雨等陪祭。明人對農業生產豐盈的期待也求諸於天，孟春祈穀、孟夏雩禮所祀的對象皆為自然的天。《說文解字》並解釋：「藍，染青草也」。劉熙《釋名》詳細說明：「青，生也，象物之生時色也」。在沒有檢測色差儀器的時代，青色涵蓋綠、青、藍等色彩。然，仔細觀察釉色，諸多單色青釉的色調皆極為相近。景德鎮御窯能燒出類似色系瓷器的原因，在於御窯廠的管理制度。檢視《陶書·回青》（頁 832-835）條，窯廠將原料交由窯工製作之前，會先燒造樣品，藉製作樣品的經驗得知不同器皿、花樣所需的瓷土及釉料的份量。並據此經驗，交予窯工特定量的原料，藉此管理成品的大小、厚薄及釉色的統一性。窯工的成品也會根據樣本驗貨，杜絕減料之疑。此制度的運作，使各類釉色的呈色達到一致性。

明代大約在夏至時分祀地，瓷器用黃（圖 22），陪祀以岳鎮、海瀆、陵寢、山川與

城隍。黃色之於五行位四方的中央。《周易》：「君子黃中通禮，正位居體，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亦即把四方的事物比論成人體的手足，黃色譬喻人體的驅幹，其他色彩則如同人之手足，亦即黃色「兼四方之色」。東漢許慎則有「黃」為「地之色也」，即黃色是大地和土壤的顏色。黃色居世界之中的特質，也被明代政治象徵壟斷，變成尊貴崇高，即代天管理民間事物的帝王之色。

### 二、祭日月、家廟用紅與白

紅，清代文字學家段玉裁註解《說文解字》：「大紅如日出之色，朱紅如日中之色，日中貴於日出」為正色。嘉靖時期祭日的單色紅釉器（見圖 13）以礬紅為主，嘉靖九年及二十六年（1548），將鮮紅「改造礬紅」（《陶書》，頁 901）。

許慎《說文解字》云：「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白釉瓷器祭月，皇室宗廟祭祀也都用白色。明嘉靖十六年（1537）「遣太常寺典簿黃裳往江西燒造長陵等陵白磁盤、爵祭器」，並發樣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白磁盤、爵盞」（《陶書》，頁 875-876）。



圖24 明 嘉靖 白釉劃花龍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 清 18~19世紀 粉彩登 懷海堂藏 取自郭家彥，《皇朝禮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頁187，圖21。

### 三、龍紋祭器的時代

除了單色釉加飾金彩或獸耳尊之外，院藏明代單色釉龍紋碗（圖 23）、盤（圖 24）的數量不少，筆者設下伏筆，在上述文章內容已使用嬌黃暗龍高足碗（見圖 16）及青釉雲龍紋碗（見圖 21）等單色龍紋器皿來陳述祭器。檢視

《陶書》，其中有「青、白瓷暗花雲龍羹碗、淺盤、酒罇、爵盞、山罍、壺瓶各樣祭器」樣稿送景德鎮燒造的成命。又，嘉靖二十三年（1544）令燒造桌器 1,340 桌，每桌 27 件，其中包含「裏青雙雲龍等花樣三百八十卓，暗龍紫金等花樣一百六十卓、金黃色一百六十卓、天青色一百六十卓、翠青色一百六十卓、鮮紅改作礬紅一百六十卓」。（《陶書》，頁 877-878）據兩則皇室交辦景德鎮燒造的內容觀察，當時暗花雲龍紋的青、白等單色釉器皿及黃、青、紅單色釉，既是祭器也是桌器。這現象是明代祭器花樣在嘉靖定制之外的轉變。以龍紋作為祭器的現象，雖然尚未見於禮制文獻紀錄，但兩百年後的清乾隆（1735-1793 在位）時期，也設計粉彩雲龍紋登（圖 25）作為祭祀太廟正殿之用。十九世紀光緒年間製作的一批各色國家祭祀器皿，其中毛血盤（見圖 15）也是運用龍紋裝飾。據此瞭解，清代祭器用龍紋裝飾，最晚受嘉靖祭器設計的啓發而來。只是，為何用龍紋？明嘉靖九年二月十日禮部在大禮議天地

分祀奏摺滕黃中強調，帝王為「天地神人之主，操制作礼（禮）樂之權，聖本生。」<sup>19</sup> 帝王能掌控天命！在此誇大的概念下，用象徵天子的龍紋來表現祭器，似乎也能理解。學界在詮釋明代國家祭祀的內涵時認為，明人對天的理解注

入人格化的倫理色彩，天為父，人間的帝王為子，又「天與帝為一也」。皇帝可以透過「修省，齋心革天」的方式與天溝通（李媛，2011，頁170）而象徵天子的「龍」紋作為祭器的裝飾，應該也是時代趨勢。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 註釋：

1. 王光堯，《明代宮廷陶瓷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79-83；郭家彥，《《皇朝禮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頁94-106。
2.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影印），卷210，頁2715-1。
3. （明）徐溥撰，《大明會典》（臺北：臺灣商務，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卷86，頁3-4。
4. 張璉，〈天地分合：明代嘉靖朝郊祀禮議之考察〉，《漢學研究》，2005年2期，頁161-196。
5.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卷210，頁2715-2。
6. Shih Ching-fei, "The New Idea of Ritual Vessel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Third System?" *Ming China: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6), 113-121.
7. 轉引自高憲平，〈明嘉靖時期祭祀用瓷新探〉，《文物》，2020年1期，頁67-78。
8. （明）王宗沐纂修，陸萬垵增修，《江西省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頁862。
9. 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收入同氏著，《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出版，2007），頁149-189。
- 10.（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1988，據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頁12-7。相關文獻參考秦大樹，〈宋代陶瓷禮器的生產和生產機構〉，《文物》，2005年5期，頁64-95。
11. 袁泉，〈器用宜稱：宋以降國朝禮期禮的鼎制之便〉，《華夏考古》，2020年6期，頁54-68。
12. 韓儒林，《元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卷72，頁1799。
13. 推論觀點參考林弈婷，〈從實物看明代瓷質祭器的面貌〉，《東方文物》，2019年72輯，頁58-67。
- 14.（明）朱載堉，《律呂精義》（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據明萬曆二十四年自刻樂律全書本影印），內篇卷5，頁51-52。吳洛稱「裁衣尺」為「衣工尺」。見同氏著，《中國度量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61；國家計量總局主編，《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104-105。
15. 曹淦源，〈清白瑩瑩——龍珠閣下話龍缸〉，《收藏界》，2008年1期，頁77-82。
- 16.（明）胡廣等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卷影印），卷24，頁357。
17. 劉新園，〈明永樂官窯考〉，收入首都博物館編，《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官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4，圖136；謝玉珍，〈明代官方用器的人物紋〉（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謝氏認為景德鎮御窯廠宣德地層出土的兩件白袖及翠青帶蓋梅瓶與萬曆本《大明會典》陳設圖中所繪的尊類似，尤其是器蓋部分最具特色，所以應該屬於祭器。林弈婷檢視考古出土狀態，認為明早期的祭器有用白瓷的可能性，見同氏著，〈從實物看明代瓷質祭器的面貌〉，頁58-67。
18. 以下國家祭祀概念與五行色彩的史料皆參考李媛與陳魯南的研究，因數量多，以下不再單一作註。參考李媛，《明代國家祭祀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11），頁109-248；陳魯南，《織色入史箋》（臺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177、179、189、201-202。
- 19.（明）佚名編，《嘉靖紀典考》，收入劉錚雲編，《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明鈔本影印），冊22，頁18。